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红楼书系(第一辑)

外国儿童文学发展史



✿ 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文丛 ✿



韦 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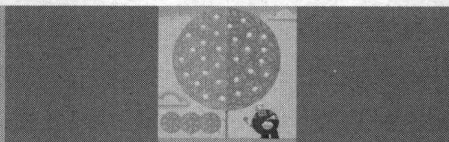
少年儿童出版社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红楼书系

第一辑 主编：方卫平

外国儿童文学发展史



❁ 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文丛 ❁



韦 苇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外国儿童文学发展史/韦苇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12

(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文丛)

ISBN 978-7-5324-7523-0

I.外... II.韦... III.儿童文学—文学史—外国 IV.I1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201956号



外国儿童文学发展史

韦 苇 著

费 嘉 装帧

责任编辑 吴芷菁 美术编辑 费 嘉

责任校对 沈丽蓉 责任监印 裘兴海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200052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

印刷:上海市印刷十厂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3.375 字数:260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7523-0/I·2723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序：论一个可能的 儿童文学学派

方卫平

“学派”作为学术累积和创造的力量和载体之一，在学术史上一直有着重要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今天，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学派”这一话题的提出，似乎还显得十分奢侈，但是我以为，对于学派的探讨和思考，不仅可以是对一种已经存在的学术事实和现象的判断和分析，也可以是对一个可能的学术存在和前景的描述和想像。在中国当代学术界，人们对于建立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派的呼唤和思考，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些西南学者对于巴蜀学派的谈论和期盼，就是学派思考中对于可能性的一种追问和探询。“浙江师大——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这一论题，也正是因此而设定、展开的。

我们知道，学派是学术发展史上在一定科学研究领域由特定的科学家们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其成员通常都有着相通的科学理念、思想志趣、学术立场、研究范式、解释体系，还有相互呼应和配合的研究成果。同时，许多学派也有着自己公认的学术核心人物或意见领袖，学派成员之间常常具有一种师承或同事关系，而一个学派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观点、独创的研究方法等等，也往往会成为学术史上重要的创新成果。事实上，任何一个被同时代或后来者公认、被学术史命名的“学派”，都必然是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链条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环节，一座无法绕开的学术峰峦。

从这样的意义和标准来看，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当然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流派。但是在这里，人们也许会问，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极富个性色彩、主要依赖个体思想创造性的精神劳作领域，为什么一个学者群体，就非要信仰、遵守共通的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呢？

这涉及了“学派”这一学者现象与学术机制在学术发展进程和学术史上的作用和意义问题。

一般说来，影响学术进步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学术传统、社会需要、



制度保障等等,但是,“真正的理论创新,只有在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中才能够实现。而能够规范、引导、促进科学家研究活动的,并同时又符合和体现科学研究本身规律的,就是作为科学家内在的活动形式的科学研究学派。”^[1]而“学派的核心思想必须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或者是对一个全新领域的开拓。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幅新的视野图景,使人们具有通过进一步工作而获得成功的巨大希望,因此,才能够吸引众多的优秀人才在这一领域持续不断地进行探索。由此可见,原始创新性思想的提出是科学学派形成的关键。不但如此,为了使其研究纲领贯彻始终并发展壮大,学派成员需要不断地开拓前进,探索创新。”^[2]所以,学派并不只是一群学者自然组合的结果,就其本质而言,学派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理论原创力的学术群体。正是这种原创力,正是一个学派特有的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才为人们带来了新的世界图景,为学术史提供了新的解释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学术史而言,个体学者的研究成果自然常常可以做出增量方面的贡献,但一个科学学派的出现,对于学术史的演进将肯定是一种质的推动和进步。

与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相比较,从整体上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积淀和理论创新度都是极为有限的。进入 21 世纪,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学科也面临着进一步提升和创新的重大发展主题。身处这样的时代和学术语境,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有必要思考自身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学术责任和作用。我以为,朝着一个可能的学派方向,做出自觉的努力和培育,或许应该是未来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可以选择的学科发展策略之一。

当我在这里提出把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看作是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的时候,该学科近 30 年来的学术沉淀和学科积累,无疑成了关于这一议题和思考的最有力的事实基础和历史支撑。

二

1978 年 10 月,国家出版局、教育部、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全国科协在江西庐山联合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会后,国家出版局等七家单位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一些年以后,人们发现,庐山会议和会后的《报告》对于“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当代少儿读物出版行业和儿童文学领域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一次会议、一个报告,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决定了一个门类、一个行业的兴衰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制度的特色和力量。时为浙江师范学院(1985 年 2 月更名为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的蒋风先生参加了庐山会议。对于当时地处浙江中西部小城金华市北郊的浙江师范学院来说,一位普通儿童文学教师的外出开会,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心和注意,不过,会后所发生的一切,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儿童文学学科在浙江师范学院的生存机遇和学科命运。



庐山会议之后,蒋风向当时浙江师院的领导汇报了有关情况,获得了赞同和支持。1979年,浙江师院中文系恢复儿童文学选修课,成立了儿童文学教研室,并开始招收儿童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一所高校与儿童文学的学术情缘,就这样开始了。

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蒋风就发表过一些儿童文学研究论著,但是对于浙江师范大学的儿童文学学科建设来说,1979年所发生的一切,仍然是意味深长和至关重要的:在“文革”结束以后,浙江师大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恢复儿童文学选修课、成立了第一家儿童文学研究机构、招收了第一名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一切,意味着在新时期中国高校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史上,浙江师大取得了毋庸置疑的先发优势和开创性地位。

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学术队伍建设。在蒋风的努力和学校的支持下,从1980年开始,一批优秀的研究人才开始从校内外向儿童文学学科聚集。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该学科先后汇聚了韦苇、黄云生、吴其南、周晓波、楼飞甫、方卫平、章轲等中青年研究者。他们在儿童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开拓耕耘、镇守把关,逐渐修炼、磨合,形成了一个既有研究分工,又有学术合作的儿童文学研究群体。到了21世纪初,在新一代学术带头人的努力和学校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下,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又陆续加入了钱淑英、郑欢欢、张嘉骅、彭懿等中青年学者。

而不断推出的儿童文学研究成果,就成了他们向儿童文学理论界展示耕耘和开创精神的基本方式。1982年,蒋风出版了中国当代第一部由个人编著的系统的《儿童文学概论》;1986年,韦苇出版了当代第一部《外国儿童文学史概述》;1987年,蒋风主编的当代第一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出版;1991年,蒋风主编的当代第一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出版;1993年,方卫平所著当代第一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出版;在国别儿童文学史研究方面,1994年,韦苇出版了第一部《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1996年,吴其南出版了第一部《德国儿童文学纵横》;1999年,方卫平出版了第一部《法国儿童文学导论》;2004年,在倡导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周晓波主编的第一部《当代儿童文学与素质教育研究》出版;2006年,在图画书创作出版崛起的时候,彭懿的当代第一部图画书研究专著《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出版。此外,黄云生的《人之初文学解析》(1997)、彭懿的《西方幻想文学论》(1997)、吴其南的《童话的诗学》(2001)等,在幼儿文学、幻想文学、童话美学等研究领域,也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在儿童文学研究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学术平台搭建、图书资料建设、对外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近年来,该学科创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儿童文学系(2003),创办了中国高校第一份综合性的儿童文化研究丛刊《中国儿童文化》(2004),成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国际儿童文学馆和台湾儿童读物资料中心(2007),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网(2007),使浙江师大的儿童文学学科建设



在整体上保持了良好的推进态势。

在中国当代的学术制度安排中,儿童文学学科通常都被勉强地归置于“中国语言文学”这一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下。许多年来,这一安排既为儿童文学学科在主流学术制度设计中争取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也维系了当代儿童文学学科在各项学术指标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最基本的学术体面。然而,另一方面,从儿童文学研究的内部知识构成和学科组合上看,它同样包括了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中外儿童文学史、比较儿童文学等分支领域。很显然,将这样一个具有独立研究对象、独特学科构成和较长的独立研究历史的学科简单地搁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二级学科名下,无疑是一种相当野蛮的、毫无理性的学术霸权行为(参见笔者《在体制的边缘生长》)。在这一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影响下,儿童文学作为一门三级学科,无法在当今中国高校的学科建设进程中,成为一个有效的学科生长点,因此,它被绝大多数的大学包括师范院校所遗忘或搁置了。如果说,儿童文学学科被一般性大学所忽视还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话,那么,它被许多师范类大学或学院所漠视,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实际上,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大学体制中,儿童文学在许多综合性院校的语言文学系、教育学系、图书馆学系等,都得到了很好的行政上和学术上的安排。这一现象,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并深思的。

但是,回顾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学科发展历程的时候,人们发现,儿童文学这一处于学术体制边缘的弱势学科,在被一南一北两个村子夹于其间的浙江师范大学,却得到了一种难得的学术尊重、呵护和培育。坦率地说,由于种种原因,儿童文学学科在浙江师大的生长,自然也并不是时时充满温情和阳光的,但是,它最终在浙江师范大学这片校园里,获得了中国所有高校中最好的大学文化土壤和体制保障——我相信,每一位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成员,对这一切都充满了知遇之感。

在中国,儿童文学与一所大学的历史与学术情缘,在小城金华北郊这片宽阔起伏的红土地上被演绎成了一段小小的学科建设的佳话。事实上,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界,“浙江师大现象”若干年来就已经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和关注的话题了。

三

由于近代以来大学制度及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提升,大学在人类知识生产和科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日益明显。大学不仅是传道授业、培养人才的基本场所,同时也是学术人才密集、知识创新活动频繁的重要平台。很自然地,大学校园也成为召集学术共同体、滋养培育学术流派的最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空间之一。例如,20世纪上半叶形成并活跃于清华园的“清华学派”,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当时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康斯坦茨学派”,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耶鲁大学的“耶鲁学派”等等,首先都是缘于其成员汇聚在同一座校园里。对于浙江师大来说,在同一座校园里,先后汇聚了



如此之多的儿童文学研究者,这种情景,为全国高校所仅见。

在长期的共事和学术研究活动中,浙江师范大学的儿童文学研究者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表现出了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学术心性和研究特点。我以为,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重学术研究的基础性。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现代自觉完成于“五四”前后。以周作人、赵景深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儿童文学研究者,在近代西方人类学派、儿童中心主义等学说的影响下,为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学术基石。其后,由于战争、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诸多原因,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发生了严重的学术水土流失状况。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作家身份参与儿童文学研究的陈伯吹、贺宜、鲁兵等人的坚守,续写了儿童文学研究一段特殊的历史。同时,经验型的文学思考,也使儿童文学研究所获得的基础理论支持越来越薄弱。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代的儿童文学研究者所面对和接收的学术家底和历史遗产是十分贫乏而有限的。

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这个时代,重新起步的儿童文学研究拥有了十分难得的学术环境并获得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聚集在浙师大校园里的儿童文学研究者们不仅感应到了现实的学术召唤,而且从现实的学术环境中不断汲取相应的理论营养,这种汲取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某些新的理论视野和话语方式,并为他们的学术思考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支持。黄云生的《人之初文学解析》、吴其南的《童话的诗学》、方卫平的《儿童文学接受之维》等著作,就是在广泛汲取哲学、美学、人类学、文艺学、心理学、神话学等多种学科养分的基础上在幼儿文学、童话学、儿童文学接受理论等论域所作的基础性理论工作。这些著作不仅显示了浙江师大儿童文学研究群体的学术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相关论域的学术水平。

其二,注重理论研究的系统性。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由于其学科积累的不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其话语形态一直呈现为一种经验型的、散乱的方式,而系统的理论成果形态则长期未能出现。诚然,思想的深广度、理论价值的高下,与思想、理论的呈现方式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零散的、片言只语式的思想呈现未必没有价值,貌似系统的鸿篇巨制未必就是真正有价值的理论成果。然而,对于儿童文学研究来说,其思想成果的零散和有序,却真实地反映了其学科整体理论建设上的滞后和贫弱。从这一背景上来看,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长期以来对儿童文学研究的体系化追求,不仅是这一学术共同体学术志趣和理想的体现,而且也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整体上的需要。在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中外儿童文学史、当代儿童文学思潮等研究领域,前述《儿童文学概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转型期少儿文学思潮史》等著作的出版,都是相关



领域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系统化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陆续出版,无疑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整体学科格局和理论面貌的历史建构过程。

其三,注重儿童文学研究的当代性。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及其系统化呈现,使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整个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显示出了独特的学院派学术风貌。一般说来,在人们的印象中,学院派的理论风格厚重、扎实,研究理路正统、规矩,但它也往往会有囿于学院的知识价值观,追求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局限。就文学研究而言,学院派的研究路数,通常容易将研究者导入文学思维的概念演绎和逻辑游戏之中,而与文学日常生活的鲜活性、当下性保持某种矜持的距离感。

在这方面,浙江师大的儿童文学学者群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外。他们在从事儿童文学基础理论、儿童文学史等的学科构建的同时,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当代儿童文学艺术实践的种种发展和变化,思考着当代儿童文学现实生活中所提出的诸多课题。例如蒋风的论文《从口水吐向安徒生到哈利·波特热——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点滴思考》(2002)、吴其南的著作《守望明天——当代少儿文学作家作品研究》(2006)、周晓波的著作《当代儿童文学面面观》(1999)、方卫平的著作《儿童文学的当代思考》(1995)等,就显示了两代学人对于当下儿童文学生存、演进现实的体察和思考;韦苇编著的《精典伴读:点亮心灯》(2006)一书则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与当代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方卫平参与主编的《新语文读本》(小学卷,2002)是将儿童文学与当代小学生课外阅读联系起来的一次成功的实践;彭懿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则是紧随中国当代图画书出版、阅读热潮出现的一部重要著作。

一座校园,几代学者,因为儿童文学,他们已经共同坚守了近30个春秋。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个学术团队的未来路径,应该如何规划和铺展。

四

关于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及其研究群体的未来发展路径,我们显然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维度去引发联想和思考。这里,我们的思考当然是从“学派”这一角度展开的。

如前所述,谈论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派,我是从可能的学术存在及其前景的角度来作为起点的。从“学派”一词严格的内涵来看,就其现实性而言,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还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派。

首先,这个群体是相对松散的。虽然他们同处一座校园,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并显示出某些相通的学术志趣和研究特点,但是,他们各自具体的研究课题、领域又不尽相同。蒋风先生作为学科的创建者,陆续出版过许多具有拓荒意义的著作,包括他主编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原



理,儿童文学辞典等方面的著作;韦苇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外国儿童文学方向,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黄云生专长幼儿文学研究,他在该领域的整体研究成果处于当代幼儿文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周晓波在当代儿童文学思潮,尤其是少年小说、童话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成果;而彭懿则在外国幻想小说、图画书等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可以说,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参与和建构,是全方位的,同时,这也反映了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客观需要。但是,从“学派”的角度看,这一学术群体的具体研究对象、个性、成果等,又是互有交叉和区别的。换句话说,他们的组合并不具有学派所要求的紧密性、统一性。

其次,研究对象、学术个性、理论成果之间的交叉和区别,还只是表面上的松散,更为重要的是,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并没有像一个学派所要求的那样,具有共同信仰和遵守的学术立场、研究方法、理论观点,或者说,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他们还没有自觉地设计出并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 and 解释体系。虽然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传承下来的传统儿童文学理论系统相比,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取得了不少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成果,其部分学者在学术视野、理念、方法等方面也实现了不断的拓展和更新,但是,由于这些拓展和更新基本上都是单个学者的个体行为,而且在视野、方法等方面主要是借用或移植了其他学科的成果,因此,它并没有对整个学者群产生具有质的意义的影响力,更没有上升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共同信仰、遵守的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

我以为,从学派培育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把握和处理下列两组关系和矛盾。

一是理论上的借鉴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儿童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后发学科,迄今并没有真正属于自身的原创性的理论学说和研究方法体系。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看,它最具活力和代表性的理论进展,主要也是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神话批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接受美学、文化研究等学说去寻求理论借鉴和支持的,例如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史蒂芬斯(John Stephens)、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Perry Nodelman)、瑞典学者尼古拉耶娃(Maria Nikolajeva)、英国学者彼得·亨特(Peter Hunt)、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芭芭拉·沃尔(Barbara Wall)等的研究,大体都是如此。因此我认为,作为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其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的原创性主要应该是以传统和现有儿童文学的理论形态和研究模式为参照,它并不排斥从相邻学科如哲学、美学、文艺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去借鉴、整合相应的学术资源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整体创新与相应的学术吸取、借鉴是相辅相成的,重要的是,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者,应该在吸收、借鉴、消化过程中,逐渐锻造、形成自己的整体研究视界、范式和方法。例如儿童文学研究的精神分析视角、接受美学视角、文化研究视角、文学教育视角



等等。今天,在中国儿童文学界,还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集体,无论它们是紧密型的还是松散型的,能以自己坚定、鲜明、独特的思想立场、研究方法、学术成果,为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整体性发展和提升,做出具有理论上的开创性、建设性意义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是学术进步的增量意义上的,更应该是质的意义上的。

因此,如何通过借鉴,实现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上的创新,或者说,如何通过创新,使通常意义上的借鉴获得儿童文学学术史上的进步意义,这无论如何都是任何一个儿童文学学派必须完成的学术使命。

二是学术团队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一个现实的儿童文学学派,必然是一个由在研究方向、主题、方法上具有一定共同倾向的研究个体组成的学术集体。如果个体之间各自为阵,互无联系,当然无以构成一个学派。如果简单地强调个体之间在研究上高度同一,以此来构成学派所谓的向心力、凝聚力,显然也不符合学派形成、发展的自然规律。事实上,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派的培育和建构可能,除了它的传统积淀和现实条件外,也跟现有研究集体的学派意识、个体研究志趣、风格、个性与学派建设的集体意志力之间的相互尊重、磨合、调适有关。一个学派的形成,既可以是研究集体主观上共同努力培育的结果,更应该是他们基于共同学术信仰和研究范式在科学活动中自发形成的一种呼应和联合。也许,当浙江师大的儿童文学研究集体在充分保持每个个体的学术天性和风格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倡导和强化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研究立场和学术风格的时候,他们将有可能以自己的集体性的学术意志和立场,以自己相互配合的理论成果,更好地融入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进程之中,甚至可以更好地参与到世界性儿童文学的学术对话之中去。

2006年夏末秋初,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学科作为新成立的浙江师大儿童文化研究院的核心学科,搬入了坐落于浙师大西部老校区的红楼。绿树掩映中的红楼古朴典雅,对于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的学者们来说,一个新的学术梦想又开始在这里孕育和生长。也许,把一个潜在和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培育成为一个现实的存在,就是这个梦想要的重要内容之一。我想,对于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的想象和探讨,事实上也是在期待着能够寻求一个方向,设定一个目标,实践一个过程,而所有的可能性,不都是在梦想和实践中最终获得它的现实性的吗!

2007年12月20日于红楼

参考文献:

郭贵春. 学派建设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J), 中国高等教育, 2006, (10).

吴致远. 科学学派的本质特征析说(J), 科学管理研究, 2003, (5).

导 论

研究西方儿童文学的非常必要性

研究西方儿童文学史,方知阿拉伯故事和印度故事很早就影响过西方国家的故事文学,例如被认为是西方儿童文学发轫之作的《伊索寓言》、《列那狐故事》、《拉封丹寓言诗》,就分别汲取过阿拉伯故事和印度故事。后来,西方人除对《一千零一夜》等阿拉伯故事继续保持浓厚的兴趣外,又注意到中东、中亚精彩的纳斯列丁(阿凡提)故事和中国故事。然而当我们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诸国的儿童文学史,则不能不承认,西方儿童文学所给予东方的,是成批量的,选择余地很宽的,经过作家智慧精制的具有鲜明现代气息的亟为东方所需的精神食粮,使东方儿童感受到真正为儿童的文学中所体现的那种对儿童的关切和爱护,使儿童感受到爱的温暖,而最主要、最可贵、具有根本意义的是感受到其中对儿童人格的尊重,使东方人得到尊重儿童生理、心理、教育特点,尊重儿童独立人格的启蒙。例如日本讲谈社在明治(1868—1912)年间出版的西方作家专为儿童而创作的儿童文学名著译本,就对日本作家产生了这种启蒙作用。这些西方儿童文学名著是《皇帝的新衣》、《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安徒生)、《两年休假》(儒勒·凡尔纳)、《王子与贫儿》(马克·吐温)、《苦儿流浪记》(马洛)、《小妇人》(奥尔考特)、《富兰德的狗》(薇达)、《小公主》(伯内特)等。

1891年,日本岩谷小波(1870—1933)的一个以复仇为内容的童话故事《黄金丸》(《小狗阿黄》)的出现,揭开了早期日本儿



童文学的新一页。而《黄金丸》的创作中就有对中世纪欧洲的动物史诗《列那狐故事》的摹仿,和从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中获得的借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起始晚于日本,而受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一样是巨大的。中国艺术童话的奠基者叶圣陶在新时期之初写的回忆录《我与儿童文学》中说:“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从郑振铎的文学遗产中,也可查验叶圣陶的话反映了当时的文学实际。在西方童话的启示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们发现了“童话”这种文学样式能够“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从而开始试作童话。印度长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它虽然是童话、寓言极丰至富的所在,但只有从英人携入的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中才能找到现代人的新意,逐渐才有了本民族现代儿童文学的起萌。

西方在儿童心理与教育研究中所显示的先知先觉,儿童文学的丰富性和它对世界儿童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决定了研究西方儿童文学史乃是深入研究世界儿童文学(包括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前提。不具备这个前提而研究东方诸国儿童文学就几乎不能指望对东方诸国儿童文学会有准确、精到的把握。令人震惊的实例是,鲁迅先生曾热忱译荐过俄罗斯盲作家爱罗先珂的童话,而当我们研究了俄罗斯、苏联的儿童文学史之后,这才恍然顿悟:鲁迅先生译荐的并非是一个在俄罗斯本国有影响有地位的作家的童话,任何一本俄罗斯儿童文学史都查不到爱罗先珂的名字。鲁迅译荐的奥地利作家至尔·妙伦的童话其情形亦复如此。苏联《表》的作者班台莱耶夫倒是苏联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但苏联的几本文学史均未曾为其辟列专章专节加以评述。中国有的论者不详底细,动辄将爱罗先珂、至尔·妙伦排列在格林兄弟、安徒生、王尔德……的名字中间,这种因鲁迅曾译荐其作品的,就想当然臆测其为“大师”的轻妄之举,惟暴露了我国某些学人的学术作风不严谨和不能直接从外文资料中查验前

人之所述。

从外国儿童文学史入手是研究儿童文学的明智之举

研究西方儿童文学可以从多种角度楔入,“史”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然而它是最重要、带有基础意义的、首位性质的角度。从史的角度把握住欧美儿童文学的来龙去脉,就是把握住了它的总体和全局。在这个基础上评衡一个欧美作家、讨论一种文学现象,才不至于失去准头,失去分寸;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说清一种文学体式在这一地区这样发展、在那一地区那样发展的原委,具有这种风格或那种风格的内在理蕴;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儿童文学的种种轨迹、种种规律性问题,才能做到本正源清,避免盲人摸象。

可见,有没有“史”这个总体和全局在胸,是很不一样的。对此,鲁迅在杂文《扁》(见《三闲集》)中曾辛辣地嘲讽过没有总体和全局,而“只有自己心里明白”的情况下,争论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不好,争来争去,到头来还“只有自己心里明白”。

中国的儿童文学起步已经迟晚,战争、动乱、失误又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与世界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就1954年成立的“IBBY”(国际少年儿童图书协会的缩写)来说,我国1986年加入时已落后于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孟加拉和一些非洲国家许多年,更不待说落后于日本许多年,1986年虽然名义上加入了,实际上在其中起不了一个大国的作用,因而也没有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事实上迄今我国儿童文学也充其量只能算是作品数量的大国,而不是作品质量的大国。

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在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现象。但是我们对儿童文学现象的研究往往因缺少参照系而陷于主观狭隘,致使宏观气魄不足,不能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置放到世界儿童文学的巨大历史坐标系中去考察,无



法看清世界儿童文学的大趋势,及我们自己的儿童文学观念中的种种问题。具体到撰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则往往因缺乏客观标准而对作品评价其高度有失精当。

中国儿童文学工作者总爱反复说“有人说儿童文学是‘小儿科’”云云,其实这只是在一个国体超稳定的、封建意识尚还根深蒂固的国家里如此,从世界范围看,欧罗巴人和美利坚人从来也不曾有过鄙薄儿童文学之意。在他们那里,更多的则是在成人文学创作中已经显示出卓异才华的作家,以向孩子奉献作品为荣、为欣慰,而专为儿童写作的作家则以拥有成人读者和少儿读者两部分人为自己的追求。在艺术才华和艺术成就面前,在艺术生命力面前,在“传世”和“不朽”面前,所有的艺术品种都是平等的。在欧洲,作家协会主席、笔会中心主席是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杰出作家完全是正常而普通的事。意大利童话作家罗大里1980年逝世,正在中国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立即从北京发唁电回罗马,表达哀惋之情。世界上可以同《圣经》的印数相比的,唯有儿童文学作品,例如格林兄弟童话、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小熊温尼·菩》、迪斯尼趣味故事等。

研究世界儿童文学的人,从来不曾觉得儿童文学的屋檐要低矮些。

从外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中引悟出儿童文学真谛

研究西方儿童文学史所解决的、所能解决的,远不只是了解和识知欧美儿童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它的发展过程,产生过哪些被世界公认的作家和作品。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引悟出一些儿童文学的真谛。

譬如,儿童文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这里不妨借苏联卓越作家勃·波列伏依1954年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一段话来加以阐述。他说:“我们有一个尚不曾研究过的法

则,根据这个法则,在少年儿童时代读过的好书,是永远不会忘记,一生都留有印象的,而依我看,这个法则正好反映出儿童文学的全部重大意义和无比重要性。关于这一点,使我们感到自豪的大作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总是带着非凡的爱心,我还要说,他们总是用特别认真的态度来为儿童写作,而且极端关心这种帮助下一代形成他们的意识、性格和理想的文学的发展。”许多年后,德国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作家奖荣获者詹姆斯·克吕斯也用十分通俗的话语道破了同样的真谛,他说:“孩子们会长大,新的成年人是从幼儿园里长成的。而这些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那些给他们讲故事的人。”不少明星级人物在追溯自己成功的源头时,也都不约而同地肯定了儿童文学作品对他们的正面影响。

譬如,儿童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定义性的问题。西方儿童文学史告诉人们: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的出现和发展,儿童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被把握,使儿童文学逐步超越儿童读物的宗教宣传目的,超越忽视想像力的卢梭主义,超越道德训导,超越以遥远故事宣泄对现实不满的心灵,超越宣泄自我(尽管宣泄心灵、宣泄自我造成了一批优秀之作,把儿童文学的水准往高处推了一大步),超越单纯的娱乐目的。作家们开始把作品写得8—80岁的人都喜欢读当做自己最高的理想追求。作为文学总体一个有机部分而存在的儿童文学,首先应该强调它是文学,不过它是顾及儿童接受特点和考虑到儿童理解能力而创作的文学。除了儿童的接受特点和理解能力需要作家悉心照顾,儿童文学和一般文学没有别的分野。

譬如,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特殊关系,始终顽强地表现出来。从民间文学对儿童文学的渊源关系上看,从民间文学在儿童中间盛传不衰的情况判识,它们甚至不仅仅是两种“近亲文学”。民间童话故事最早是人类历史黎明期的一种教育形式、交



流形式和娱乐形式,后来是道德伦理教育和实用教育的形式。农人用自己的意识,把故事主人公都描绘成善良憨厚的人物,并由于他们的优良品行而一跃成了国王;市民用随机应变的小买卖人意识创造了从外表乍看并不起眼,却能凭自己的机灵打入社会,甚至成为发财致富的人物。民间童话随着时代的变迁,受到越来越多的文学加工,得以从古代伴随儿童到如今。几个世纪来,一直有作家从民间文学汲取营养,创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更多的作家从民间文艺中得到启示,创作出典范之作。“从民间文学到儿童文学是一条金光大道”(陈伯吹语)。

譬如,研究西方儿童文学史,还可以发现在文学体式上也不都只是成人文学影响儿童文学,只是成人文学带引儿童文学,像儿童文学中的小说文体是从成人文学演绎出来的那样。须知科学幻想小说这种体式最初就是由儒勒·凡尔纳为孩子阅读、表达未来的科学假定而创造出来的,而后来,科学幻想小说也成了成人文学的一个品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童话也开始成了成人幻想小说的一种,例如超长篇童话托尔金的《指环王》(中译作《魔戒》),实际上是一部成人幻想小说,一部意在向成人传播思想理念和人生感悟的新神话。动物文学并不专为儿童而写,却一开始就拥有大量的儿童读者,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界限向来就是模糊的,两者向来就是一笔糊涂账,而且越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越是如此。

获知儿童文学内部和外部的互渗现象

研究西方儿童文学史,可以发现存在于儿童文学内部和外部的多种融汇、渗透、互补现象。这种现象是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内在驱动力量。

儿童文学和儿童绘画间的融汇、渗透和互补现象,产生了一类十分重要的、主要是为幼年儿童而准备的文学读物——图画